

人大常委会宴请法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

彭冲副委员长受叶剑英委员长委托主持宴会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人大常委会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梅尔马兹议长率领的法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

彭冲副委员长受叶剑英委员长委托并讲了话。

彭冲在讲话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法国的关系，并认为近一年多来，中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是继续发展的。他指出，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也不无差异，但我们都珍惜自己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反对扩张政策，并为克服战争危险，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面临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说，法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早已存在着友好联系，中法

建交后，两国议会之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加和密切。他表示，中国人大愿意为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继续作出努力。

彭冲还谈到，中国正在为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依靠自力更生的同时，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强同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他说，法国是同我们发展关系很早的发达国家，同我们发展经济技术交流，有良好的基础，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大有可为。

梅尔马兹议长在讲话中说，法中两国在历史上都曾遭受过许多战争苦难，并抵御过外来侵略。今天我们两国都坚决维护民族自决权和各国人民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法国人民深切地爱好和平，坚持民族尊严与独立的原则。因为我们

认为，和平是在尊重各国人民尊严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的。

他指出，不幸的是，当今世界上，不干涉原则正在遭到践踏。他说，法国同中国一样强烈谴责在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对各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如对柬埔寨问题、黎巴嫩问题就是这样。

梅尔马兹议长表示，法国为了恢复黎巴嫩人民的主权，发挥了自己作用。我们希望现有的解决办法能够使黎巴嫩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的安定与发展。

他说，法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以及捍卫民族权利而竭尽全力地作出贡献。我们同共同体国家

一致，坚持有利于南北对话的一些积极立场。

他表示相信，代表团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发展法国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真正的和充满活力的友谊。

宴会前举行了酒会。梅尔马兹议长和夫人及法国资深同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愉快地交谈。他们中有郝德青、刘大年、曾涛、邢亦民、章文晋、贾石、姚广等。

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人大、政协举行宴会

招待廖仲恺、何香凝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缅怀廖仲恺、纪念何香凝逝世十周年活动的廖仲恺夫妇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主持了宴会。

王震在青年时代就被廖仲恺、何香凝的革命事迹所吸引。一九二五年廖仲恺遇害时，正是在粤汉铁路纠察队工作的王震参加了悼念活动

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示威。解放后，他曾

多次看望何香凝老人。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日本友人宫崎世民、官崎千代、黑田寿男、黑田明男；港澳同胞何贤夫妇、邓广殷夫妇、马万琪夫妇。

廖梦醒和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以及他们的子女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习仲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国务委员薄一波，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康克清出席了宴会。

教育下，有着明确的学习目的，那就是要献身自己祖国的事业。这个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使人们变得聪明、变得勤奋。在这种情况下，有了老师的精心培养，他们便能很快地掌握医疗技术。”

他的眼睛射出深邃的光芒，我情不自禁地凝视着他，继续听他说下去。

“只有你爱学生的时候，学生才会爱你，你爱他爱得深，他爱你也爱得深。一种自然的平衡会调节这种师生关系。而师生的互爱正源于为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了这种互爱，老师教书感到有劲头，学生念书感到有奔头。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不是可有可无的。”

只听得他又说：

“人是应当有理想的，应当为着一个崇高的目的而活着！我不相信名位和金钱可以使人们有用之不竭的动力，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出有高尚目的的人，有献身事业精神的人，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教育是一个大问题，若不重视它，后患无穷。”

他的这番话语，在我心灵的海洋里激起了层层波浪。

他略顿了一下，又说：“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闯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道路来。”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当然这种精神的内含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而有异，然而它的实质是永远不会变的。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勇于不断地攀登，在于同形形色色的困难搏斗，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这时，我才蓦然理解了他那样推崇陈翰笙同志的原因，也才懂得了他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不出名的中国青年诗人杨丽华同志。显然，在他看来，陈翰笙为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是无价之宝，而杨丽华则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创作的精神令人鼓舞。

人必须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来作为动力。

在同他告别之前，我总觉得他的一席话似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我说：

“这么说来，您是在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献身事业、勇往直前的延安精神吧！”

“是的！正是这样！在中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同样迫切地需要延安精神！”

在返家的途中，我离他的住所越走越远，而精神上却感到越来越近。亲爱的同志，他发出的这个呼唤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啊！

同艾黎同志漫谈

田森

听着他的高论：

“战争年代，我去过延安。我佩服延安的教育，它为解放区造就了大批出色的人才。我也在国统区办过教育，积累了一些办教育的经验。解放后条件好多了，造就出来的人才也的确很多，这是可喜的。不过我总觉得在今天的教育中还有应当加强的地方。”

他望了我一眼，轻声地说：“你不觉得吗？”我一时真不知如何回答。

“动力！动力呀！加强动力教育嘛！”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西北办了一所培黎工艺学校。新西兰医生斯宾塞夫妇也在我们这个学校工作。他们只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学校从难民出身的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外科医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取得如此满意的成绩呢？难道是这些穷孩子比一般人更聪明吗？”他看着我那出神的面庞，慢慢地说：

“不，不是的！那么是斯宾塞夫妇具有超人的特殊本领吗？不！也不是！”

他没有接着说下去，显然是想给我留下一点思索的时间。就在这一瞬间，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快步走向书架，迅速地取出了一本像册，他见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于是便打开像册，告诉我当年培黎学校的学生中谁现在成了主治医生，谁负责领导一个医院的工作。

他的声音变得比先前高昂了一点，我顿时觉得他仿佛年轻了好多。在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幅中年时代艾黎的形象，一个把自己的热情、才智、心血都倾注在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新人的教育家的形象。

我放下了手中的像册，注意地倾听这位老人提出的人深思的问题。

斯宾塞夫妇除了有一手好技术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献身中国人民事业的赤子之心。他们热爱孩子，孩子也热爱他们。他们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最亲密的朋友关系。一句话，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你能掂量得了这种关系的份量吗？”

他呷了一口咖啡，又说：

“这些学生的天分算不得高。然而他们在学校

“爱社会主义”的中心内容是什么？

问：宪法修改案第二十二条为什么把“爱社会主义”列为“五爱”之一，这一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

答：宪法修改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这与建国初期我国的临时根本大法——《共同纲领》规定的“五爱”有一点不同，即那时的最后一项是爱公共财产，而不是爱社会主义。因为《共同纲领》只规定党的最低纲领，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制度是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社会主义）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8页）同时，国家提倡爱护公共财产也表明了，国家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可见《共同纲领》这样规定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牢固地确立起来。全国人民正在以实际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宪法修改案把爱社会主义列为“五爱”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把爱社会主义作为我国社会公德的内容之一，能够确切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德的内容和性质。因此草案这样修改是十分必要的、科学的。

宪法修改案规定，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又推动物质文明向前发展，二者密不可分。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个方面。而思想建设又是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草案第二十二条的中心内容，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出规定，它表明国家在思想政治领域中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因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人民中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内容很广泛，它包括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和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一切行为规范。比如：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伟大理想和行动；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革命气节；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高尚的思想情操和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等等。而集体主义则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核心。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武装人民群众，能够增强人民群众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残余思想和其他一切腐朽思想侵蚀和影响的能力。宪法修改案关于我国社会公德的规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杰 徐秀义）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有何区别？

问：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次公布的宪法修改案第三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两者有何区别？

答：从制定宪法的意图讲，“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两者的含义是相同的，现在的宪法修改案所以要做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后一种提法，把意思表达得更为准确。因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能解释为在已经制定的法律面前，公民在适用法律、遵守法律等方面一律平等，谁也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决不能解释成在制定法律上也一律平等。而从文法上说，“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语中的“在……上”意指“在……方面”，因而这句话就可以解释为在制定法律方面，也就是在立法上也要一律平等。要是这样解释的话，就不正确了。

为什么公民在立法方面不能平等呢？

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来看，在阶级社会中，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法总是统治阶级制定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制定法律的权力历来由统治阶级独享。资产阶级否认这个事实，标榜立法平等。法国《人权宣言》中

说：“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的法历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和政府里制定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根本无权参预也无权过问。无产阶级公开表示，社会主义的立法权由人民独享，不与人民的敌人分享。正如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对沈钧儒先生所说：“我们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虽然已经消灭了，但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还存在，因此立法权还不能让所有的公民都享受。“公民”与“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民是个法律概念，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从政治上划分，公民则可以分为人民和敌人两部分。如果规定公民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岂不等于说，敌人和人民可以平等地享有立法权吗？这

是绝对不行的。既然公民在立法上不能平等，为什么在遵守法律、适用法律等方面可以平等呢？

公民在遵守法律方面一律平等，就是说，任何公民，不论其职务大小，地位高低，能力强弱，都必须同样地受法律的约束，都必须严格守法，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必须同样地受到法律的追究，不得逍遥法外。

关于公民在适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我国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五条作了如下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不得歧视任何公民。凡属我国公民，都要保护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是敌人、是罪犯，也应享受法律所赋予他们的那部分权利，对此法律也应同样保护。第二，对违法犯罪行为，不管行为人是谁，具有何种身份，都要用同样的

法律标准去衡量，给予同样的法律惩罚，不得有任何偏私。犯了什么罪，必须处以什么刑，做到罪与刑相一致，既不能因为行为人的地位高而免予处罚或罪减一等，也不能因为行为人地位低而罪加一等或乱罚一气。必须用同样的法律尺度去衡量同样的法律行为，用同样的法律惩罚手段制裁同样情形下发生的同样的违法行为。

在执行法律方面，公民有依法担任司法职务的平等权利。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三十八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以上规定表明，担任司法职务的权利只有部分公民可以平等地享受，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以及不满二十三岁的公民，虽然现在享有政治权利但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公民则不能享受。这是立法上规定的公民在执法上的不平等权利。

由此可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以立法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这种对不同阶级、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规定，正是社会主义法律的阶级性、科学性的体现。法律一经制定，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就要依法办事。宪法草案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是要求每个公民事事都要依法的规定办，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本意也是指除立法权以外公民在适用和遵守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由于措词不够确切，曾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现在草案对这个提法作了修改，就可以避免发生误解。

（徐炳）

吴学谦约见日本大使就教科书问题表明我国原则立场

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今天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官泽喜一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谈话，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吴副外长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官泽喜一谈话的内容，并作了有关的说明。中国政府进行研究后认为，尽管日本政府表示要充分听取批评，负责纠正教科书的有关记述，但是并没有提出能够令人满意的、明确而具体的纠正措施，同中方要求相距甚远，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中国政府对此不能表示同意，中国人民也是无法接受的。

吴副外长表示，中方已经多次指出：承认还是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容含糊其词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不能同意日本政府以所谓维护教科书审定制度为理由，而不采取果断措施，纠正审定教科书的错误。中国政府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并有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此，鹿取泰卫大使表示，将立即如实地报告日本政府。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官泽喜一于二十六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要倾听邻国的批评，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但对如何纠正态度暧昧。

官泽说，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日本的行为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国民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对此进行反省，并不让这样事情重演。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陈述了“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认识。即使现在，这个认识也没有丝毫改变。官泽说，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当然也应该受到尊重。而今天，中国等国家对我国教科书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述提出了批判。我国将在推进同亚洲邻国友好亲善的基础上，充分倾听这些批判，由政府负责纠正。

但是，官泽没有明确提出纠正教科书中错误的具体时间或措施。他对这个关键的问题只是推说，“在今后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将经过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讨论，修改审定标准，注意到充分体现上述精神。”至于已经审定的篡改了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官泽说“今后将迅速采取措施，以使同样的精神得到体现”，在这以前采取什么措施，将由文部大臣发表见解。

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在同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他回避纠正教科书中错误的责任，而是说他“决定向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迅速地提出咨询，请他们进行研究”。对于已经审定完毕的教科书，他只是含混地说到“尽可能迅速地采取措施”。

小川说，重新纠正后的教科书将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使用。而一九八三、八四年将仍然使用已审定过的（即篡改了的）历史教科书。不过，要根据文部省的“文部公报”，在教育现场进行实际上的纠正。但他没有说如何纠正的具体内容。

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对官泽谈话表示异议

坚持要求立即纠正教科书的错误记述

新华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日本在野党和各界人士对内阁官房长官有关教科书问题的谈话表示异议，坚持要求立即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记述。

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新自由俱乐部二十六日分别发表的声明一致指出，教科书中有关问题的记述，在政府见解中没有约定立即纠正。这三位在野党的书记长在发表声明时，对这一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公明党的声明强调指出，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行为，“显然是侵略，内阁应统一见解，向国内外表明态度”。

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首相在八月二十三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以及这次内阁官房长官的谈话，都确认没有改变中日建交联合声明的基本态度，这种认识是重要的，日本和日本人都应全力贯彻这一原则。但文部省有关教科书问题的发言，“不能说该省的态度是果断的”。文部省在订正问题上，强调教科书的